

第二現代
——風險社會的出路？

顧忠華 主編

◎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C 9-106

第二現代 ——風險社會的出路？

顧忠華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顧忠華主編．
-- 初版．-- 臺北市：巨流，2001〔民90〕
面：公分

ISBN 957-732-137-2（平裝）

1. 社會變遷 - 論文, 講詞等 2. 未來社會 -
論文, 講詞等

541.407

90006224

第二現代
——風險社會的出路？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編：顧忠華

地址：100 台北市博愛路 25 號 312 室

電話：(02) 23711031 · 23148830

傳真：(02) 238158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 5 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41299514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 957-732-137-2

2001 年 6 月初版一刷

定價 32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作者簡介

(排名按文章次序)

- | | |
|-----|-----------------------------------|
| 顧忠華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 |
| 劉維公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
| 周桂田 |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組助理教授 |
| 孫治本 |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 魏書娥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 林志鴻 |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
| 呂建德 |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
| 陳宜中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

目 錄

「風險社會」系列叢書編輯緣起	i
編者序	iii
1. 第二現代理論：介紹貝克與季登斯的現代性分析（劉維公）	1
2. 風險、社會與倫理（顧忠華）	17
3. 科學風險：多元共識之風險建構（周桂田）	47
4. 風險抉擇與形而上倫理學（孫治本）	77
5. 個人主義化與第二現代（孫治本）	99
附錄：學習型理性——與貝克談第二現代（孫治本）	127
6. 第二現代與日常生活中的美學體驗（劉維公）	141
7. 全球化趨勢與全球性思考（魏書娥）	159
8. 全球化與社會福利（林志鴻／呂建德）	193
9. 第三條路：新時代的新政治？（陳宜中）	243

「風險社會」系列叢書編輯緣起

一個社會的發展，猶如個人的生涯一般，不可能完完全全沒有任何「風險」，小至日常不小心造成的種種傷害，大至一個人或社會集體遭受到自然或人為災害的侵襲，導致生命財產的損失，人類的共同經驗中的確充滿「風險」的記憶。不過，當一個社會被稱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時，它總要有些特別的道理。而諷刺的是，過去傳統社會充斥著各種天災，人們在知識不足的條件下，往往不是逆來順受、便是試圖訴諸巫術來祈求平安，但這樣的社會並未被形容為「風險社會」，反倒是進步到科學時代後，當人們自以為可以控制自然，不再讓天災肆虐時，人類的科技卻製造了不少嚴重的災害，使得「風險社會」這個標籤應運而生。換言之，「風險社會」主要指的是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帶來的「高風險」，這類風險一般人常無法自行判斷（如臭氧層的破洞、或幅射屋的威脅等等），需要專家評估，但在風險不確定、難以認知及後果可能延展的狀況下，出現了新的「風險分配邏輯」，並改變了過去慣常的權力和責任行使模式。於是，人類在工業化突飛猛進的態勢下，一頭栽進了「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概念的最早發明者，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他於一九八六出版了《風險社會：通往另一種現代之路》（*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一書，由於當時正好發生蘇俄車諾比爾核電廠意外，這本書立刻成為暢銷書，「風險社會」一詞也流行起來。貝克的生產創作能力相當旺盛，繼「風險社會」後，他一方面嘗試發展「個人化」(Individualisierung)理論，另一方面和英國的著名社會學者季登斯(Anthony Giddens)共同建構「反省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論，還提出「第二現代」來和後現代主義打對台。但回歸到他最具創意的貢獻，仍是非「風險社會」莫屬，他藉著檢視現代科技的社會影響，將「風險」詮釋為足以改變資源分配方式的重要因素。亦因此，「風險社會」甚至可以視作是「工業社會」的另一個階段，人們的生活動力更從追求物質的滿足，改變為對「安全」的需求。的確，如果觀察西方先進國家，他們有不少人對各種「風險」的焦慮，常是筆墨難以形容，這也構成了環境保護運動的強大後盾。從這個角度切入，可以觸及到科技、政治、經濟、法律等等複雜的面相，讓我們更深刻地瞭解現代社會運作的全貌。

基於以上的考量，我們將編輯出版一系列「風險社會」的叢書，其中包括翻譯、著作和論文集，皆是探求相關主題的理論與實際現象，透過這套叢書，應當可以較有系統地引介及發展「風險社會」的論點，讓國人對國外及本土的風險論述有進一步的認識。

顧忠華

2001/2/10

編者序

當社會的變遷愈來愈快速，社會「自我描述」的更新速度也相應地提高，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諸如「後工業社會」、「後資本主義社會」、「資訊社會」、「網絡社會」等概念便不斷出現，令人目不暇及，而「後現代主義」則是異軍突起，似乎較其他概念更為強烈地聲稱「現代」已經過去，接下來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後現代主義」這種「重斷裂、輕連續」的主張，作為一種思潮或藝文運動，實無可厚非，因為任何美學創作，都可以突顯其獨特風格，所以由建築、文學、繪畫、音樂、舞蹈、乃至各種論述文本，都可以流行「後現代風」，但是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的變遷而言，要說人類再次經歷了如「傳統」到「現代」的鉅變，過去的歷史等同「終結」，未來行將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構狀態，那麼未免言過其實，不符合人們的一般經驗。更因為後現代主義比較規避以嚴肅的態度去處理人類社會共同問題，西方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如哈伯馬斯便曾抨擊過此一思潮，認為這會讓人們無法認清自己所處的情境，削弱了批判精神。哈伯馬斯與後現代主義的辯論發生在一九八〇年代，到了九〇年代，德國的貝克和英國的季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現代」論述，可看做是延續了對後現代的駁斥，並且有延長戰線到新世紀的趨勢，這段當代思潮的演變，構成了本書主題的時代背景。

本書中的文章大多數曾宣讀於「第二現代：個人化、全球化

與風險社會」學術研討會（2000年6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行），亦有數篇發表於《當代》雜誌及《政大哲學學報》，而書名訂為《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則是作者們經過多次討論後的意見。顧名思義，「第二現代」的概念自然是全書的主軸，但是其中仍有不同的重點，「風險社會」無疑是另一個關鍵字眼。當初貝克等人選擇「第二現代」概念的用意，多少擺明了與「第一現代」存在著既延續又斷裂的關係，而面對風險的態度，在他們看來具有相當的指標性意義。「第一現代」或「簡單現代化」的行為和意識模式，往往不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決策會帶來那些風險；工業化和發展高科技在「第一現代」被視作是人類進步的象徵，卻無法根除各種「意外」產生的安全威脅，從輻射塵到狂牛症，都只證明人類永遠保證不了絕對的安全，惟有徹底地「反省」過去的慘痛教訓，並建構一套新的「反省性現代化」，人們才可能自覺地透過決策來評估風險、抑制風險，同時尋求各種途徑來防止風險發生。依此來看，台灣汲汲於興建核四，證實了台灣尚未跨入「第二現代」的門檻，仍停留在「簡單現代化」的集體意識，但放眼未來，現代科技風險對台灣社會的衝擊勢必愈來愈明顯，我們需要及早了解西方，尤其是歐洲在這方面進行的種種「反省」，並從中擷取寶貴的經驗，提高我們對於各類風險（生態污染、基因食品、科技災變等等）的敏感程度。

就全書內容的編排而言，本書第一篇論文具有導論的性質，扼要地介紹了貝克和季登斯的現代性分析，作者劉維公為德國特里爾（Trier）大學社會學博士，第二篇到第四篇皆環繞著「風險社會」加以闡釋，作者包括編者本人（德國海德堡 [Heidelberg]

大學社會學博士）、周桂田（德國慕尼黑 [Munich] 大學社會學博士，亦是貝克指導之學生）、及孫治本（德國波昂 [Bonn] 大學社會學博士）。除了風險社會的論述外，本書在主題方面還涵蓋了「個人化」（或「個人主義化」）、「全球化」、和「第三條路」，這些範圍不僅僅涉及到對於社會變遷趨勢的掌握，也有著歐洲社會學家於診斷問題後開出的藥方。在「個人化」方面，第五篇和第六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析論「個人化」的理論建構，與在日常生活中的可應用之處，並附有孫治本教授專訪貝克的紀錄。接下來，第七篇魏書娥及第八篇呂建德和林志鴻（三人均是德國畢勒菲德 [Bielefeld] 大學社會學博士）針對的是「全球化」現象，他們就「全球化」在文化領域及社會福利制度方面的影響，作了深入的探討。至於第九篇的作者陳宜中是本書作者中唯一非留德的學者，他是於英國劍橋（Cambridge）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對季登斯的「第三條路」政治路線提出了徹底的批判，也間接地開啟了更多對「第二現代」的省思空間。這九篇論文的主題，有些表面上看來似乎互不相干，但實際上是縱橫交錯，其共同點是透過對貝克和季登斯等人的詮釋，讓我們了解到現代社會更繁複的「自我描述」，並幫助我們思考人類將來可能面對的種種問題及其解決之道。

細心的讀者應能注意到，本書的作者們在介紹各項與「第二現代」有關的理念、制度及對策時，並不是照章全收，而是審慎地檢視其合理性與可行性，尤其在立論上，都有相當精闢的獨到見解。由於本書作者群皆有留歐的背景，在思想訓練上特別擅長於理論的論證與批判，稱得上是國內社會科學界水準整齊的一支

「理論隊伍」，這是過去比較少見的，本書呈現了這批新銳學者的心血結晶，希望讀者能夠接受，並繼續關心相關議題的後續發展，是為序。

顧忠華 謹識

2001/2/10

第二現代（second modernity）理論： 介紹貝克（Ulrich Beck）與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現代性分析

劉維公

台灣學界越來越重視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概念、或是英國社會學家季登斯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概念的討論。如果仔細閱讀其研究著作，可以發現到「社會的巨變」是兩位作者所凸顯的主要意象，也是其理論發展的主要觀照點。近幾年來，貝克與季登斯將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分析成果命名為第二現代理論，並積極在公共論述領域上發表其觀點與主張。這使得研究者在理解貝克或季登斯的學說思想時，必須認識到第二現代理論此一更為寬廣的思維脈絡。

「第二現代」理論學派的形成

貝克將他所主編而由德國著名出版社魯康（Suhrkamp）從1997年起發行的一套系列叢書命名為「第二現代」（Zweite Moderne），結合不同學科領域與來自不同地區國家的專業學者，定期發表出版相關的研究著作。這一套叢書的出現可以說是，「第二現代」理論從個別學者零星的概念論述，正式成為學術界集體的思想風潮。在德國，此一叢書目前已有十幾本專書出版。

一開始，這個學說理論主要是由貝克以及英國的季登斯與瑞旭（Scott Lash）三位當代著名社會學家所共同積極建構的，雖然他們之間在深一層的論證上明顯有不同的觀點想法與研究重點。在社會學研究領域中，貝克、季登斯與瑞旭長久以來致力於專研「現代性分析」（analysis of modernity），各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發表，如貝克的《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 1986）、季登斯的《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瑞旭與洱里（John Urry）合寫的《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1987）。在這些著作中，他們對現代人類社會整體的變遷發展，提出相當敏銳及精闢的觀察與解釋。

1994年三人共同撰寫《反省式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一書。在書中，三人一致認為，現今的社會結構與生活形式已發生劇烈的變化，因而強調，現代化發展過程來到了一個新的型態，即從「簡單式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轉變成「反省式現代化」（這點稍後將詳加說明）。在1996年的德文版序言中，貝克、季登斯與瑞旭則以「第二現代」此一詞彙來凸顯，他們在現代性分析上不同於一般「現代 vs. 後現代」論爭的研究立場。近幾年來，他們分別陸續在其著作中進一步闡釋第二現代理論的主張。由於他們三人對當代社會學的影響力，第二現代理論如何在人文社會科學界發酵，相當值得注意。

「世界秩序已經解體。而這正是開創第二現代的契機！」這句話是貝克針對這套魯康叢書編輯提出說明的第一句話。然而對社會科學界而言，這樣的宣稱恐怕不會再令人感到興奮或是新鮮。因為關於現今人類社會的巨大變化，早有不少的解釋觀點，

如以某一核心要素描繪現代社會的「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訓育社會」（discipline society）等概念、或是以時間序列關係為特徵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m society）等概念。這些主張充斥在公共論述領域，形成眾說紛紜的狀態。因此，區分「第一現代」（first modernity）與「第二現代」的主張，是否真能釐清對二十世紀末人類社會的認識？第二現代理論是否應該被視為只是眾多說法中的新一項論點，而如同其他論點一樣，只是掌握到現代化發展過程的一個面向？尤其是，雖然存在相當多的爭議性，但無論如何「現代 vs. 後現代」仍是學者專家在進行現代性分析時習慣參考的主要座標。「第一現代 vs. 第二現代」能否取代此一既存的思維座標？

由以上的鋪陳可以瞭解到，第二現代理論的發展首先面臨兩大問題：一是如何與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社會理論進行概念典範轉移的競爭？另一則是除了序數（如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或第一次、第二次等）或類型（第一類別、第二類別或第一向度、第二向度等）的意涵外，第二現代此一概念所要凸顯的現代社會核心特徵究竟是什麼？

與後現代主義理論進行典範轉移的競爭

第二現代理論強調下述的發展狀態，即後現代並未到來，但現代卻已經劇烈改變。事實上，貝克、季登斯與瑞旭在論述時，正是以後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為主要的對話對象。他們積極吸收，

但同時卻也嚴格批判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季登斯認為，不應該將對西方啟蒙（the Enlightenment）理性的批判、對歷史演化定律的質疑、對基質主義（foundationalism）認識論的否定等現象理解成後現代性的表徵，而相反地，這些現象應該被當作是「現代性激進化」（the 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ty）的發展結果，是與現代性本身內在的反省機制密切相關。當代人類「並沒有超越現代性（beyond modernity），反而是正生活在它的激進化階段中」（Giddens, 1990: 51）。由於對現代性的堅持，使得季登斯取代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被冠上「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the last modernist）的稱謂（參考 Mestrovic, 1998）。

瑞旭則更進一步指出，後現代主義所呈現出來的人類社會是「靜止狀態」（stasis）而非「運動狀態」（movement）、是「固著性」（fixity）而非「流動性」（flux）（參考 Lash and Friedman, 1992）。在後現代主義者的宣稱中，如主體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社會的終結、空間的終結等，人類事物的發展已來到了盡頭，人類事物的運動已表現出疲態。例如法國學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後現代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將「大眾」（the mass）描繪成巨大的「黑洞」（black hole），它不斷地吸納所有的能源如文化、歷史、意義等，但卻不會將它們轉化成任何的行動。社會被大眾的黑洞所吞食，導致社會的死亡（參考 Baudrillard, 1983）。相對於這樣的世界觀，第二現代理論則是致力於說明正在發展的新型態人類社會活動（如全球化的趨勢），並著重於探討促使人類社會持續運動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與偶成性（contingency）因素（如風險的不可控制性）。

第二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 以現代性反省現代性

因此，不同於後現代主義急於為現代性做「蓋棺論定」式的宣判，第二現代理論將焦點放在現代性本身的激進化與變異性。對貝克、季登斯與瑞旭而言，與其說是「後現代」的來到，倒不如將當代社會的變遷解釋成「現代化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modernization）。然而，此一詞彙並不意味著，第二現代理論試圖為現代性是否是「未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志業」問題翻案，或是主張第二現代像是接力賽跑似地接下第一現代的重擔，朝目標終點線繼續奔馳。如貝克所指出的，現代化的現代化不是「以現代化救現代化」的意思，而是現代化的「自作自受」（Selbstanwendung）：在過去，現代化是以所謂的「傳統」為變革進行的對象，而如今，現代化本身則是成為現代化的對象。在前一個現代化——即簡單式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的農業封建社會結構與生活形式被解體（aufgelöst），而由工業化的社會結構與生活形式所取代（abgelöst）；在後一個現代化——即反省式現代化——過程中，換工業社會本身變成是「新的」傳統而成為被解體與取代的對象（參考 Beck, 1993）。現代化並未停止，反而是更為激進。

由於現代化的現代化是以自己本身作為改變的對象，所以貝克、季登斯與瑞旭稱之為反省式現代化。在此一過程中，現代性既是作用者也是被作用者，因而不同於在簡單式現代化過程中，

現代性是單純的作用者，而所謂的「傳統」則是被作用者。在反省式現代化中，現代性被當作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如同當初它把「傳統」當作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樣。第二現代理論想要探索的正是：當現代化注意到其所帶來的巨大破壞力，而反省自己（即以現代性而非後現代性的立場反省現代性）時，會發生什麼情況？「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可以說是第二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依照貝克、季登斯與瑞旭的理論建構，第二現代是理論取向的標竿，而反省式現代化是實質研究的重心。

然而，「行動的反省操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一直是人類行動的特色，並非是現代人所特有的。因此，以「反省」作為特定人類社會的核心要素，需要更進一步的論述說明。事實上，對「反省」一詞不同的見解，也正是貝克、季登斯與瑞旭三人在第二現代理論上持不同論點的關鍵所在。限於本文論題的範圍，底下將僅介紹貝克與季登斯的主張，而不去說明瑞旭關於「美學的反省性」（aesthetic reflexivity）的討論。¹（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三人皆使用 reflexivity 一詞，但其內容卻明顯有不同的指涉。因此，原文的翻譯必須隨著不同理論家而改變。）

貝克：反省是「自我對質」（self-confrontation）的「反身性」（reflexivity）

貝克指出，他們三人所使用的「反省式現代化」概念的「反

1. 請參考本書第六章〈第二現代與日常生活中的美學體驗〉。

省」一詞有狹義與廣義的兩種指涉。狹義的反省是與「知識的密集」（knowledge-intensive）操作有關，指的是創造、收集及累積更多的知識，將之應用在現代化的發展條件、結果與問題之上。廣義的反省則是與「自我對質」情境有關，指的是現代化的發展基底直接面對現代化的發展後果——尤其是「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帶來的衝擊，繼而對此一基底造成自我危害、自我揚棄、與自我改造的作用。由於廣義的反省所強調的是，釋放出去的作用力反過來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情形，因此它所指涉的其實是與所有「反身作用力」（reflex）有關的「反身性」（reflexivity）而非僅是與知識操作有關的「反省」（reflection）。貝克認為，季登斯與瑞旭是以「知識反省」的角度，說明「知識的密集生產、流通與應用」對現代化過程的影響，而相對地，貝克自己則是以「自我對質」的角度，點出「非預期的反身作用力」在現代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參考 Beck, 1999: 109）。

因此，貝克主張，不是知識而是非預期的後果或是所謂的「副作用」（side effects），才是第二現代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二現代可以稱做是副作用的時代。副作用原本被認為是可以利用知識加以預測與控制且發生機率低的問題，不足以危害主要作用的貢獻。然而如今，現代化的副作用問題（如醫療保健的併發疾病、消費休閒享受的生態環境破壞、核能發電的輻射外洩、經濟成長的金融風暴等）不僅層出不窮防不勝防，而且影響的範圍愈加擴大。以往被認為可以維護安全的防護機制（如國家機器等）或承諾（如科學理性等），如今遭到強烈的挑戰與質疑，失去其

效用。這些不是現代化透過知識可以事先知道、但卻是其應用知識而自己製造出來的意外後果或併發作用，不只是使「第一現代」社會面對自己發展的極限，也嚴重侵蝕其發展的基底。

因此，貝克從副作用的觀點出發，主張「非知識」(unawareness, Nicht-Wissen)問題比「知識」更值得現代性分析的注意。非知識不是尚未知道但將會被揭露的知識，亦即它不是「潛藏的知識」(potential knowledge)。相對地，非知識就是「無法知道(the inability to know)的知識」。它的未知狀態不是以更多的科學實驗操作、更多的理性邏輯演繹而可以改變的。非知識一直存在於人類知識的領域中，但卻被當作是知識操作的副作用，是在統計數據檢證上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然而，知識的密集操作卻使人類認識到，知識並不是線性的不斷增加，而是呈現奇特的弔詭性：人類獲得的知識越多，反而知道屬於非知識的事物更多(參考 Beck, 1999: 124)。

非知識所造成的非意圖後果或副作用如今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對貝克而言，風險即是非知識的代表。透過計算，人類也許可以知道風險發生的機率，但人類還是無法知道風險究竟會在何時發生。生態風險如核能事故、口蹄疫病毒傳染等，或是社會風險如組織政策的評估、生涯規劃的抉擇等，一旦發生都將會造成致命的大規模傷害或是無法挽回的永久後果。長久以來，這些風險的存在是被允許的，因為它被認為是可以利用人類的智慧與力量加以避免或降低發生的可能性。然而在風險問題不斷成真的現今社會，此一共識已被打破。如何定義與處理風險的「非知識」因素，成為迫切的社會生存問題，也是造成不同專業知識人士、

社會運動團體、政府機構、及社會大眾在風險問題上激烈衝突的關鍵所在。

季登斯：反省性的制度化

如同前面提到的，不同於貝克凸顯現代化過程中自我對質的反身作用力，季登斯是以知識反省的角度切入，來分析反省式現代化的特色及問題。對季登斯而言，現代化的激進化對人類行動的「知識技能」(knowledgeability)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什麼樣的社會活動，人類皆需要能夠掌握與運用特定的知識與技術。季登斯將此行動綜合要件稱之為知識技能。根據季登斯的「結構歷程化」社會理論觀點，知識技能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每個人平常過生活的實用知識技能，促使日常生活順利的運行，因而能夠提供個人「生存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相反地，若是這些知識技能出了差錯，將會為個人帶來「存在的焦慮感」(existential anxiety)(參考 Giddens, 1991, ch. 2)。

人類在使用知識技能時，必定同時或多或少對這些知識技能進行反省，而非完全盲目的重複使用。但這種人類行動的基本能力並不是現代性的反省性特色。季登斯認為，「制度的反省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才是現代性獨特的地方(參考 Giddens, 1991: 20)。在當今社會，許多人類的活動受到新知識或資訊的質疑，失去了原本理所當然的自明性，而處於開放論述或爭議的狀態。然而，這些知識或資訊並非是在偶然的情況下形成，以隨性

或自動自發的方式為人所取用。相對地，它們屬於現代社會制度本身的構成元素。透過制度性的機制運作，現代社會持續的且密集的製造各項知識，為社會與個人創造出多元化的行動視域及行動選項。

季登斯稱現代社會的此一制度性機制為「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在反省式現代化的社會裡，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等各個領域都為各式各樣的「專家知識」(expertise)所滲透。專家知識所提供的資訊、建議、警告等在傳播上不僅範圍廣，而且速度快。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人們不再是單純的或是習慣性的遵循世代沿用的傳統知識技能，因為專家知識提供了可以選擇的行動空間。然而，人類社會究竟不是一般密閉的、專家可以嚴格控制變項的實驗室，專家知識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充滿了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沒有人可以確定，此時此刻所擁有的知識不會在下一刻被否定掉。另外，不同觀點與立場的專家持有不同的意見與主張，專家系統無法建立在一穩定的基礎上。因此，季登斯認為，專家系統的形成將人類帶進入一個實驗環境中，但此一實驗卻是超出人類控制能力的範圍，將日常生活變成是危險的冒險活動（參考 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59）。

季登斯進一步論述，「制度的反省性」改變了現代社會的「信任關係」(trust relation)。受心理學家艾力克森 (Erik Erikson) 及溫尼寇特 (D. W. Winnicott) 學說的影響，季登斯指出，信任是個人建構自我及身份認同的基本條件，因為若嬰兒與其照顧者無法建立基本的信任關係，在他們之間將無法形成一個分隔的空間，可以讓嬰兒發展獨立的自我。在信任他人的情形（如照顧者

不在場並不意味著失去保護）下，個人生存的安全感獲得保障，能夠發展穩定的自我身份認同。由於與生存的安全感密切相關，信任關係對往後的生命發展階段也是同等的重要（參考 Giddens, 1990: 94-96）。

基本上，季登斯區分兩種「值得信任感」(trustworthiness)：一是對熟識的人事物，另一則是對彼此陌生的人事物。前者所建立的信任關係存在相當低的未知因素；反之，後者的信任關係基礎則是建立在相當高的未知因素之上。現代人對「專家系統」的信任是屬於後者，因為專家往往不是生活中所熟識的人，而是從未謀面的陌生人。現代人與專家之間不是私人的「對人的信任」(trust in persons)，而是非私人的「對系統的信任」(trust in systems)。換言之，現代人不是對專家本人，而是對其所代表的系統有信心。現代化的一大特色在於，從以「對人的信任」為主轉變成以「對系統的信任」為主的人際互動方式。

此一改變是否代表著生活世界為系統所殖民，這問題並不是季登斯分析的重點，其研究強調的是，隨著「專家系統」的發展，人類的「私密生活」(the intimacy)（包括身份認同建構、親密伴侶關係等）發生明顯的轉型。由私人的人際網絡（家族或生活圈等）所形成的信任關係，長久以來是個人確保私密生活領域安全感的主要機制。如今，相當私人的人類私密生活領域則是被以非私人信任關係為主的「專家系統」所介入。專家知識保障個人私密生活領域的安全感，專家成為處理個人婚姻、家庭、事業、心靈等問題或危機的主要諮詢對象。

為何是「第二」現代？

第二現代理論特別的地方在於，它強調以現代性本身的立場反省現代性：自我反省是第二現代的特徵；第二現代是自我批判的社會。「反省」概念不僅是第二現代理論家的共同主張，從此概念出發，更可以清楚看到貝克與季登斯（當然包括本文未深入介紹的瑞旭）在看法觀點上的差異，即反身的副作用與反省性的制度化的區分。本文是一篇介紹性的文章，無法完整的說明第二現代理論（例如貝克的「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的研究、季登斯的全球化研究、及瑞旭的身份認同美學化研究等）。然而，由於第二現代一詞字面上會引起不少的聯想，因此有必要再特別針對下列幾點做解釋。

第一，第二現代的形成不是有計畫的，不是預期的。沒有出現激烈的社會大革命，一切都是在個人正常生活與社會正常運作下，但人類社會卻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貝克以一弔詭的公式描繪整個過程：「欲求的+熟悉的=新的現代性」（The desired + the familiar = new modernity）（Beck, Giddens and Lsah, 1994: 4）。第二現代理論強調，現代化過程不是被命定的而是「低度決定的」（underdetermined），充滿偶成性。這也正是為什麼「第二現代」理論家相當重視副作用、風險、信任等與不確定性密切相關的概念。借用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的話，簡單式現代化追求的是建立秩序，而「反省式現代化」則是承認「未定性」（indeterminacy）與「曖昧性」（ambivalence）（參考 Bauman,

1991)。

第二，雖然第二現代基本上指的是取代工業社會的新型態社會，但第二現代不應該被視為單純的線性演化。從「反身作用力」或「知識反省」概念可以看出，第二現代理論並不認為社會演化只是向前進而不會向後退。相反地，以自我反省作為第二現代社會的特徵，正是想要凸顯現代化過程中推進與拉回同時發展的矛盾糾結狀態。第二現代主要彰顯的並不是價值位階上的差異如前與後、高與低、先進與落後等，而是人類社會生活的變化本身。因此，本文將原文英文 second modernity 或德文 zweite Moderne 翻譯成「第二」而非「第二階段」或「第二次」現代，即是為了降低優先序列的意涵而是強調社會變遷的發生，因為「第二」一詞也可以是「第二類型」、「第二向度」的意思。然而，無論如何，在「第二現代」此意義下，現代性不再是單數的，而是多數的，有「另一個現代性」（another modernity）的存在（參考 Lash, 1999）。

第三，在第二現代社會，不平等問題仍繼續存在，並未消失，但是問題的內容與形式有很大的轉變。如瑞旭所指出的，在反省式現代化過程中，並非每個人都是「反省性贏家」（the reflexivity-winners），對於那些在知識生產、流通、與消費過程中被排斥在外或屬於弱勢的團體如老年人、低下階層工人、家庭婦女、少數族群等，都是此一現代化過程的「反省性輸家」（the reflexivity-losers）（參考 Beck, Giddens and Lsah, 1994: 127）。第二現代理論家並非天真的擁抱現代性，反而是積極建構合乎社會變遷的社會政治批判理論，如季登斯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 概念 (參考 Giddens, 1991)、貝克的「次政治」(sub-politics) 概念 (參考 Beck, 1993) 等。

也許這些說明仍然無法消除一些論者的疑慮，因為他們認為「現代性」本質上就是個「鐵籠」(cage)，走避都來不及，更無法接受第二現代的到來。第二現代理論所提出的另類思維則是：現代性不只是一個，理性不只是西方啟蒙理性一種，現代性可以反省現代性，現代性本身可以激進化。「掙開現代性鐵籠」是社會批判理論的目的。如今鐵籠是打開了，但打開之後是什麼樣的情況？

只是「另一個現代」。

參考文獻

Baudrillard, Jean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Semiotexte.

Bauman, Zygmunt

1992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M.: Suhrkamp.

1993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Frankfurt/M.: Suhrkamp.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Giddens, Anthony/Lash, Scott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Eine Kontroverse*, Frankfurt/M.:

Suhrkamp.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ash, Scott

1999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Lash, Scott/Friedman, Jonathan

1992 "Introduction: Subjectivity and Modernity Other," in Scott Lash, Jonathan Friedman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pp. 1-30, Oxford: Blackwell.

Lash, Scott/Urry, John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estrovic, Stjepan G.

1998 "Anthony Giddens," *The last Modernist*, London: Routledge.

風險、社會與倫理 *

顧忠華

一、前言

1992年，台灣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輻射屋事件，遭受輻射污染的鋼筋被充作一般建材，蓋成了公寓大廈，住在裡面的居民渾然不知，直到有部份住戶在健康上出現了異狀，才查出事實真相。事件曝光之後，引發民生別墅住戶的恐慌，集結起來向政府交涉，並在日後成立「輻射安全促進會」，但由於輻射傷害的程度不易確定，迄今未達成賠償之協議，更有住戶因無搬遷之財力，仍住在原處。在此同時，其他的輻射污染建物陸續被發現，包括桃園有三條輻射馬路、一九八二到八三年間之建築有三百多戶住宅被污染，上千位民眾受到牽連（張武修／詹長權，1994）。另外，電腦專家近來不斷警告「Y 2 K 千禧蟲」問題的嚴重性，因為老舊的電腦系統無法辨別以四個數字表達的年份，到了公元兩

* 本文曾宣讀於政大哲學系主辦之「哲學、社會、文化」研討會，1999.1.6，台北，並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五期，頁19-37。感謝與會人士及兩位評審提供的寶貴意見，內文已據以修改，當然，如有任何錯誤，仍由作者自行負責。

千年，可能會誤以為是一九〇〇年，導致在航空管制系統、金融管理系統和電力、通訊、貿易等仰賴電腦處理資訊的系統出現失靈狀況，如果一旦發生「意外」，後果將不堪設想。以上這兩個事例，具體而微地標誌出現代人的兩難處境，也就是一方面享受著科技帶來的各種便利，但另一方面又常面臨高科技所製造的「高風險」情境，完全超出一個人能夠正常應付的範圍之外。

在這層意義下，有關「風險」如何形成、評估、預防與善後等問題的知識，愈來愈成為影響現代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社會學自誕生以來，一向對於社會的變遷極為敏感，持續地嘗試由各種角度「診斷」這些改變的根源，以便提出適當對策。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時代感，西方社會學家貝克（U. Beck）、紀登斯（A. Giddens）、列許（S. Lash）等人自八十年代後期以來，圍繞著「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展開論述，他們認為在風險意識的覺醒下，西方已逐漸脫離舊有的「現代工業社會」模式，朝著另一波「反省性的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之方向演進。本文嘗試從這類診斷式的論述出發，探討在工業化所造成之風險愈來愈「全球化」的趨勢下，應如何重新思考個人與集體間的「倫理」關係，以避免行動者（包括政府決策者與企業經營者）採取「有組織的不負責任」（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之態度，不斷製造並加深風險帶來的威脅。作者認為，除了法律、政治及經濟系統皆必須制訂相關之規範（如環保法規、政策及防污標準）外，個人行動亦需強化具風險意識之「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取向，方能夠有效因應「風險社會」的危機。

二、風險、理性與現代性

在人類的生存情境中，「風險」自始便是一個不得不去處理的問題。從哲學人類學家蓋倫（A. Gehlen）的觀點來看，人類的特徵乃是「本能的貧乏」（Instinkt-armut），亦即他的本能並未提供固定的行為反應模式，因此人類和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是具著「世界開放性」（Weltoffenheit），必須不斷透過自身的活動來「建構」相對穩定的互動結構，這也是人們會創造出各項社會「制度」（Institution），來規約集體生活，以及共同規避自然環境之種種災難的理由（Gehlen 著，何兆武／何冰譯，1994：5）。蓋倫的論點，指出了人類和環境的關係，經常隨著工具的使用與改進，包括科技的發明與進步，而產生巨大的變化。換句話說，人類的存在條件本身就具有著極大的「不穩定性」，雖然「趨吉避凶」可以視作一般人行為選擇的原則，但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人們面臨威脅時的任何「決定」都包含了一定的「風險」：其結果可能對他有利，也可能對他不利。不過，「風險」概念的意涵不應侷限在客觀可能發生的天災人禍，還須包括人們主觀上的心理狀態，所以即使客觀的「危險」實際上不存在，只要人們認定可能受到危害，便容易產生心理的恐慌或焦慮。¹由於對「安全」、「穩定」的追求，構成了人類心理需求的一個重要層次，傳統社會有不少機制便應運而生，幫助人們處理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如巫術、風水、占卜、乃至宗教儀式，莫不蘊含有以人為努力來降低風險發生機率的動機與願望。但另一方面，自